



文艺研究新视野

“纯诗”的中国化研究

CHINESE STYLE PURE POEM IN CHINA

高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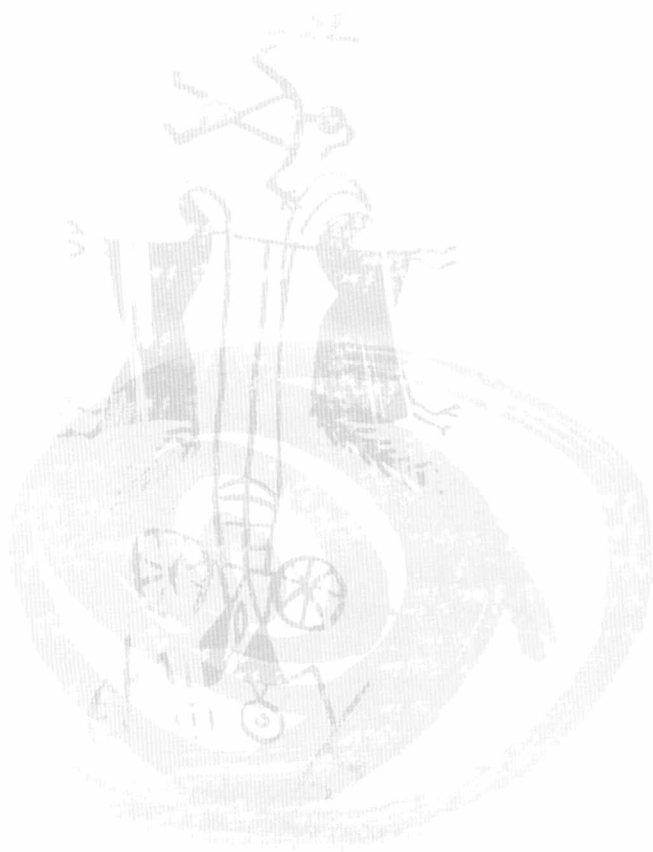
五色石丛书
WUSESHI CONGSHU

文艺研究新视野

“纯诗”的中国化研究

CHINESE STYLE PURE POEM IN CHINA

高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诗”的中国化研究/高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004-7069-4

I. 纯… II. 高…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3837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易 凡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提

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际，站出了一位曾经抁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五色石丛书》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可以引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姬，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黄周星《唐诗

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这就把伦常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更杰出的创造,是把炼石补天神话的终点当作新起点的创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女娲炼石补天时被弃置的一块顽石当作通灵宝石,带到人间走了阅尽繁华与悲凉的一遭,写成了“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精神启示录。由五色石引爆的这些奇正创新,综合创新和跨越式原始创新的丰富思路,应该成为《五色石丛书》的向导,引导我们进行根柢扎实,又五彩缤纷的学术探索,或如宋朝一位隐居黄山的诗人所云:“我有五色线,补袞袞可新;我有五色石,补天天可春”(汪莘《野趣亭》)。

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世界视野空前开阔,创新欲望空前旺盛,学理思维空前活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思想学术文化已经以其无比丰厚的成绩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也迎接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扑面而来的机遇中的严峻挑战。高科技对文学生存方式的强势介入,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批量性推动,消费时尚对文学潮流的极端吸引,以及网络、图像参与其间的新媒体文学表达形态,包括林林总总的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文学等形态的火爆滋生,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今日之文学已远非昔日之文学了。对于原有的文学格局、形态和秩序而言,这里所面临的泛化性的消解和创新的包容的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当今学术界的学理担当能力。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出

现了一些与女娲神话类似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危机，大概也不应被看作是危言耸听吧。那么，又从哪里找到补苍天的五色石，立四极的鳌足和止淫水的芦灰呢？若能够由此写出女娲炼石补天的新篇，也是本丛书不胜翘首期盼的。

令人满怀信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百摧不折，往往在艰难的挑战中出现超强度的爆发，在爆发中显示了坚毅的魄力和深厚的文化元气。浩瀚雄厚的多地域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实践，成为它层出不穷地为人类提供文化经验和创新智慧的不竭源泉。且不说旷世莫比的少数民族神话，即便中原神话虽未衍化为长篇英雄传奇，却散落为遍地开花的民俗奇观。五色石在历朝志怪和许多地理志中，屡有记载，女娲庙在甘肃秦州有，湖北房州也有。女娲抟土造人处据传在汉武帝《秋风辞》吟咏的汾阴，女娲墓则在九曲黄河最大的弯曲处古潼关附近的风陵渡，因为女娲风姓，风陵也就成了娲皇陵了。中华民族是把自己的母亲河和这位创世女神连在一起的。五色石散落之处有广东产端砚的山溪，《元丰九域志》云：“端溪山有五色石，上多香草，俗谓之香山。”明代诗人说：“女娲炼馀五色石，藏在端溪成紫霞。天遣六丁神琢砚，梦中一笔夜生花。”（张昱《题端古堂》）既然五色石散落岭南，那么炼石的灶口在哪里？在太行山。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说：“石炭即煤也……（山西）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五色石通过创世女神之手，成为一种天地交泰的文化生命结晶，它一头联结着赋予人类生存以温暖的“坚黑而光”的能源，另一头联结着文化创造的“梦笔生花”的灵性。在如此浩瀚无垠的天地、人类、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造，尽管阅尽风云变幻的价值重建、形式变换和文学边界模糊，但我们的民族也有足够的底气、智慧和能力，在文学研究中注入充满活力的

“纯诗”

的中国化研究

人类审美本性的精髓，从中焕发出现代大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品格和创新气象。

明诗有云：“五色石堪炼，吾将师女娲。”（周瑛《至广德作东园书室》）是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调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给出新阐释，师法女娲炼石补天的原始创新行为，炼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大国的思想学术的五色石的时候了。

4

杨义

2008年6月1日



高 蔚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来信希望我能为此写个序，我就爽快地答应了。应该说，我是没有能力和资格为她的博士论文写序的，其一，是我在纯诗方面缺乏研究，所知甚少，所以没有能力提出什么很好的意见；其二，高蔚曾是王铁仙教授的博士生，这篇论文是在王铁仙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高蔚和我多有交流，但是基本上是她给予我的多，我并没有提供过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所以也是没有资格来写这个序的。

但是，我为什么又答应写这个序了呢？

第一，当然是因为学术方面的原因，我愿意为高蔚的这个选题、这份研究、这项成果叫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甚或在中国整个文学研究中，“纯文学”研究不仅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是一个敏感、不大受欢迎的领域，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谈到“纯艺术”、“纯诗”、“为艺术而艺术”之类，就会招来非议。现在情况好多了，但是在艺术观念及其研究方面，依然没有大的改善，人们对于所谓“纯”的观念依然陌生，缺乏精神文化上的认同。

显然，这是有深刻的文化原因的，其中包含着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同。对此，早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就有深刻的感触，他认为中国

学术乃至中国文化最缺乏的就是“纯粹美术”和“纯粹哲学”的观念和境界，所以学术乃至文化研究最终都难免流于“俗”——这个“俗”在他看来就是功利化、有用化的追求。我想，王国维在当时提倡“纯粹美术”和“纯粹哲学”，就是想跳出传统的“官本位”的文化圈套，冲破所谓“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和无用之分”的禁忌，追求一种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境界。但是，他最后自尽了，因为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氛围中没有找到这种认同，只能用生命来呈现这种“纯粹”了。所以，王国维之死，同林琴南哭灵一样，具有某种“行为艺术”的意味，是其心志的一种终极表达。

可惜，尽管日后王国维的国学成就和文化襟怀日益受到尊敬和认同，但是国人对于“纯粹美术”、“纯粹哲学”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缺乏历史和观念上的传承和创新。而高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执意选择并完成这个选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和创新，更在于显示了高蔚很高的心志和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而这正是我最看重、最敬佩的，所以也愿意在这里为她鼓掌和叫好。

第二，我是很想在这里表达对于高蔚的谢意的。高蔚来信说，她很感谢在写作论文期间我给予她的帮助，这实在令我感到汗颜，因为我确实对此知道得很少，做得也很少，倒是高蔚在那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对于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令我难忘。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有朋友还以为我被整死了呢，打听我还活着吗），很多朋友和学生因此也疏远许多，我甚至感到自己是否还有资格当一个教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蔚竟然不在乎、也不相信一些流言飞语，向我请教一些学术问题，敞开心胸讨论一些文化和学术现象，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奇，一个弱女子（她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强壮）竟然能够如此执意于自己的认定。这也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和力量，使我不至于完全沉沦下去。由此，我也深深感到中国社会及其学术发展的希望所在，毕竟社会发展了，进步了，尽管可能还存在一些局部的

“小文革”，但是“十年动乱”不可能重复了，一代新人已经步上了新的征途。如今高蔚又一以贯之，请我给她著作写序，我又怎能不感怀良深，表达自己深深的谢意呢？

高蔚心气很高，且品位纯正，前路必然有诸多困难和挫折，我在这里衷心祝愿她能一路保重，养气修神，取得更大的成绩。

赘言为序，请指正。

殷国明

2007年9月15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殷国明(1)
第一章 “纯诗”及其中国化的思考	(18)
一 “纯诗”:一种艺术美的极致追求	(19)
二 “纯诗”的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49)
第二章 “纯诗”的中西方渊源	(55)
一 “纯诗”的先声:唯美艺术思想	(56)
二 中国传统诗学中的“纯诗”	(71)
第三章 “纯诗”观念的引入	(78)
一 中国新诗无形式感的困惑	(82)
二 周作人:从象征主义的诗艺入手	(94)
三 “纯粹的诗”:与散文清楚分界	(104)

“纯诗”

的中国化研究

2

第四章 美与生命本性的召唤..... (120)

- 一 “新月”诗人:为艺术的灵魂“构造适当的躯壳” (122)
- 二 邵洵美:凝视美的姿态、颜色与形状..... (142)
- 三 于赓虞:歌哭灵魂的声与色 (172)

第五章 中国纯诗的诗性意识与诗性品格..... (187)

- 一 廓清“纯诗”概念的纷扰与历史来处..... (194)
- 二 中国纯诗诗性品格的确立..... (208)

第六章 中国纯诗的生命形态..... (221)

- 一 寻找声、色、义同时启示的世界..... (222)
- 二 “到你自己的灵魂里去”,感悟生命的经验 (238)
- 三 音乐的“缺席”与“在场”的音乐性..... (251)
- 四 “用电影的手法写诗”,“捉住那些不能捉住的
东西” (273)
- 五 戏剧化:在“想象逻辑”里,不同张力和谐作用的
模式..... (296)

结语..... (315)

附录 1934 年的《现代》:误译抑或误印

- 关于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 (320)

后记..... (330)



“纯 诗”(the Pure Poetry)是法国象征主义的诗学命题,最初是由美国诗人爱伦·坡,出于对当时美国文学严重的道德说教倾向的抵触而提出的一个回归文学本体的艺术构想:单纯地为诗而写诗,“这一首诗就是一首诗,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这一首诗完全是为诗而写的”^①。爱伦·坡描画的这种纯粹的诗,以“美”为目标,美是它的真正要素。他从艺术心理的角度指出,美深藏于人的精神深处,是人的本能,是人对外部世界多种感觉的愉快之源。然而,如果只是复制这种美的感受,“还不是诗”。他认为,人的内心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渴望”,这渴望“不仅是对我们当前的美的鉴赏,而且是一种疯狂的努力,以到达更美的美”。对美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是一个自然结果”,“属于人的不朽性”,因而“也是人的永恒存在的标志”。诗的境界就是依靠人对这种美感愉悦之情的需要,通过想象(“预见”)而创造的一种“美妙”(loveliness)感觉,这感觉是“神圣的和令人发狂的种种喜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全部地、

^① 爱伦·坡:《诗的原理》(杨烈译),载漪漪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一劳永逸地把握”它，我们只是“通过诗或通过音乐，简单地、隐约地瞥见了这种种的喜悦”。对这种“神圣美妙”的把握是要与人的思维常态和思维惰性进行一番斗争的，而这正是诗人或艺术家的职责，因为诗人的灵魂是“结构得十分恰当的灵魂”^①。不难看出，爱伦·坡的“纯粹的”诗，是一种美的欣喜若狂的“彼岸辉煌”，诗或者诗境界中“最迷人的音乐”，只是助人通向这“永恒世界”的工具。因此，诗的感情不只可以存在于文字媒介中，还可以在绘画、雕刻、建筑、舞蹈等各种方式中，特别是在音乐中得到发展，而“文字的詩可以简单界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②。

波德莱尔接受爱伦·坡这个创造“神圣美”的艺术思想后，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始终都想在诗歌中创造一个现实之外完美的理念世界，他们把这个目标纳入了自己的艺术理想。前期象征主义诗人多醉心于通过感官直觉表现“自我”的“最高真实”，后期代表瓦雷里却认为诗应该走出这种“自我”。瓦雷里把“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句格言，视为“文学的铁的规律”，在他看来，诗需要“传达某一个神奇的超越‘我自己’的‘自我’的思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语言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诗人需要从“日常语言中提炼出一个纯正的、理想的‘声音’，这个‘声音’要不软弱，不僵硬，不刺耳，又不破坏‘诗的世界’的短暂存在”，因为诗人的任务“是使我们感觉到单词与心灵之间的一种密切的结合”，以达到一种“奇迹般的结果”^③。

象征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出法国后，在代表性诗人里

① 爱伦·坡：《诗的原理》，载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瓦雷里：《诗与抽象思维》，载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页。

尔克、叶芝、艾略特等人那里，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智性内容。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将他们的艺术纯粹性带出了对个人感受空灵之美的沉溺，他们将宗教、美学和现实生活共同熔铸进艺术与现实的统一性中，力图在尘世中找到永恒不朽的艺术的灵境。

爱伦·坡的“纯诗”阐释使我们看到，“纯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在更基础也更广泛的意义上，其实表征为一种纯艺术理想。尽管爱伦·坡心仪的那个“神圣美妙”境界，最终成了象征主义“纯诗”的理论目标，但就单纯的纯艺术理想而言，这是人类艺术的共同心愿，只不过象征主义将它“纯粹”化了，或者说是“极端化”了。象征主义承袭的是自古希腊柏拉图而来的崇尚理念世界的艺术传统，他们要寻找马拉美所说的那朵“万花之上的花”。由于与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格格不入，对并未摆脱原始野蛮、愚昧的工业文明极端痛恨，象征主义诗人将一种针对现实政治的抵触情绪带入艺术领域时，他们甚至对文艺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也深恶痛绝，因此，他们的纯艺术追求，在现实层面，实际上是以一种先锋的艺术姿态与既定秩序叫板。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他们在心理上严重失衡，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只有躲进艺术，去赎回丢失在凡俗人生中的心理满足。他们不乏极端地否定文艺的社会作用，痛苦的实际境遇造就了他们的超功利审美立场。最终，一种原本来自仇视现实的情感、情绪，因执著的艺术追求而被赋予了理论身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象征主义诗人实际上是在唯美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学理化、合法化了唯美思想的艺术存在。

其实，如果说“纯诗”首先是作为一种自觉的美感意识而潜藏于人的精神幽微之处，那么，这种美感意识在人类诗性意识萌生时就已经存在。尽管在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性想象能力那里，这种“美感意识”靠原始思维所具有的天赋的诗性创造力（他们发达的想象力）得以实现时，其出发点（现实目的）并非求美，而是求善；但人类早期

的美感意识是与“善”纠结一体的，“美”与“善”的剥离，是人类理性意识成熟后，艺术思维划分审美特性与道德、伦理的本质区别时所为，是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以后的事。在原始人类那里，人凭自己的“诗性智慧”与自身兽性厮杀，一步步认识自然、认识自我所经历的人类自然进化过程，其本身就是对美的创造，它导引人类巩固人性、完善人类秩序的善举所显现的向善本能，是一种精神境界与浩然之气，它蕴藏着人类面对自然的强大、神秘和人类自身的兽性禀赋时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存意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体现了庄子所说的那种天地间自然存在的无言之大美，以及古希腊的美学传统——美是有机体的多样化统一与和谐，是“善”所体现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尽管我这里所说的原始人类诗性意识萌生时的美感意识，更多是一种与“善”纠结一体的外在行为，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天然的美所赋予的天然的诗性。正像维柯（Giambattista Vico）所说，对于生物体，生存价值最大的东西就是最美的东西。^① 这样的认识，是对“类”的存在与发展的使命和摆脱原始野蛮的崇高（大美）欲念所造就的原始创造力的肯定，而人类的“创造”本能就这样积淀为诗的一个基本的或曰本质的元素了，尤其对象征主义诗人而言。可以这么说，没有创造性就不可能有象征主义“纯诗”理念的诞生。

任何一种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都有其历史。笔者把人类诗性意识萌生时所潜藏的美感意识纳入“纯诗”研究视野，是因为笔者始终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诗之所以为诗，诗之所以有“诗”的命名，本身就在于它的艺术纯粹性，因为诗是人类艺术精神的最高显现，它代表那种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浪漫、美好的精神需要，它是人

^① 维柯：《新科学》，载《朱光潜文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类超越艺术的一切物质形式而进入的纯精神世界中的某一至高境界，艺术的精神原本不掺和任何功利目的。然而，为什么象征主义还要在诗之中特别辟出一块称之为“纯诗”的领地？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考察了与“纯诗”概念相交叉的“诗”。笔者认为，如果把诗看作人类生命活动的心灵史、人类心灵成长的记录，看作人类的艺术思维活动，而非某一种艺术形式，那么，诗与“纯诗”应该是一个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家关于原始思维特性的研究，为我们今天将诗从人类的“文化”遗迹，向史前的“天地之声”拓展，提供了一个发生学的研究思路。由此，笔者借鉴了学术界对诗的文化身份的研究成果。譬如：在人类艺术思维成熟之前，诗的情感、意念曾寄身舞、乐、图腾等原始艺术，诗的话语方式也因最早是宗教礼仪活动的祭祀颂祷言辞，而与歌、谣等专载情感的有韵文体来源不同^①。诗的这些文化身份，对理解“纯诗”何以把音乐性纳入诗的本体构成，象征主义诗人何以坚信诗就是用来表达生命的神秘的，为什么象征主义的全部艺术思想都潜藏在波德莱尔的《契合》里，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特性如何对“纯诗”的宗教意识发挥了作用等问题是有价值的。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考察，意味着一次人类艺术精神史的巡礼，它使笔者的课题——“纯诗”以及中国“纯诗”的生命形态，拥有了自己相对完整的艺术身份。

根据叶舒宪教授的研究，在中国上古之前，“诗”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寺”人手中。“寺”的原型是主持祭礼的宗教领袖——祭司或巫师，这意味着汉语中的诗“最初并非泛指有韵之文体，而是专指祭政合一时代主祭者所歌颂之‘言’，即寺人所颂祷之词”。叶教授认为，“诗和礼一样，原本是王者统治权即神权的确证”，王者的衰败才

^① 叶舒宪：《“诗言志”辨——中国阉割文化溯源》，《文艺研究》1994年第2期。